

往事如昨

咱工人的野营拉练

邢俊岐

上世纪70年代,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干民兵,每年都要定期进行军事培训,和部队一样,也要组织野营军事拉练。

1972年刚过完春节,烟台二轻系统组织了一次野营拉练,共有500余人参加,按照营、连、排、班建制。我们烟台橡胶厂男女民兵共22人参加,分别组成了两个班,隶属三连三排。拉练为期近一个月。在整个拉练过程中,虽然不及部队严格、正规,但也是有模有样。

记得行军的第二天,三连的宫连长、肖指导员安排我班为尖刀班。我们是全连唯一一个全是男民兵的班,任务是为大部队探路打前站,宿营地是栖霞的英灵山。

清晨,我们从福山门楼镇先于连队早半个小时出发。得到了连首长的信任,大家情绪高涨,精神焕发地急奔在沙土路面的公路上,穿行在弯曲陡峭的山林间,不时地向老乡们打探路径,随时用树枝、石块等物做好路标。由于是第一次执行这样的任务,心情既兴奋又着急紧张,天气乍暖还寒,在公路急行赶路时已微汗浸身,在山路驻足辨方向时,冷风灌进脖颈,忍不住打寒颤。尖刀班相互协作努力,当日15时到达了英灵山革命烈士陵园,圆满完成了连里下达的任务。

当晚,我们宿营在陵园广场东面的一排平房里,睡在麦秸草打的地铺上。饭后,连部指示我班承担晚间站岗巡逻的任务。

后半夜,我和董龙华被叫醒去换岗,值3点到5点的岗哨。顶着凛冽的寒风,我俩在营区巡逻了两遍,然后爬上了停在广场上的“解放牌”汽车的车厢。此时,清朗的夜空繁星点点,一弯残月清冷地挂在半空,稍远的山坡上传来阵阵松涛声,白色的石碑若隐若现。近处的狗吠声中,偶尔夹杂着几声狼嚎。我俩在敞篷车厢上冷得微微发抖,心中既紧张又害怕,手中紧握着半自动步枪,警惕地巡视着广场和营区四周,着急地等待着接岗人员的到来。

下岗后,还未等进入梦乡,又被起床号叫醒。人还在迷糊中,就整理完了内务和装备。饭后集合列队完毕,伴着朝阳,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行程。

在栖霞蛇窝泊镇宿营时,大队干部和群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我们分别住在老乡家里,秉承着老八路的光荣传统,住下后,争先恐后地帮着老乡清扫院落和街道,为老乡们挑水直到缸满为止。对在城市长大的我们来说,居然也学会了在井中打水。一开始,水筒在井里左摇右摆,七上八下就是不听使唤,老是灌不满水,急得脸上直冒汗。在老乡的指点下,我们掌握了水筒的摆动技巧,终于将满筒水提出井沿担走。

接连部通知,以班为单位包饺子改善伙食,这也是拉练中唯一的一次。我们男女两个班合在一起,到连队的伙房领了面粉、猪肉、白菜回来。随后进行了分工,女同志调馅、包饺子,男同志负责擀面皮、烧火、下饺子。我们借了房东家的家把什,灶台、柴火由房东家供给。一时间大伙七嘴八舌,谈笑风生,各显神技。经过共同的劳作,终于饺子出锅,大家其乐融融地饱餐了一顿。

饭后,我们列队到村中的广场集合,观看了公社宣传队为我们和老乡们演出的现代吕剧《红嫂》。

拉练中尤为艰苦的一次行程,是在从驻地到乳山县的马石山区。那天我们三连是全营的后卫连,我班又担任连里的后卫班,由于碰到了特殊情况,当天走了近100华里。

从清晨出发,一路上同志们情绪高涨,各班、各排互相拉着歌,精神抖擞地行进在公路上。午饭后休息了一会儿,下午继续行军时,队伍发生了变化。由于连日的行军,有人脚上的泡还没有好利索,个别体弱者也未得到很好的休息,致使整齐的队列也不能保持了。特别是太阳落后,很多人都顾不上纪律的约束,有东倒西歪走路的,有几人相互搀扶着走的,掉队的人员满道都是。这可苦了我们后卫班。我们一边鼓励掉队的,一边吆喝不想走的赶紧起来走,对体弱的也不时地帮他们拿着背包送一段路。到达宿营地时,我们班每人身上至少有两个背包,我还多扛了一支半自动步枪,人人都累得筋疲力尽,连话都懒得说了。

21时左右,马石店公社枣林大队的干部及一众老乡,走出半里多地迎接我们这支疲惫之师,并帮我们携物一同回村。虽然天时已晚,但老乡们依然热情不减地等待在寒风中,像迎亲人一样把我们接回家中。

我和班里的张洪起、董龙华三人分到一家,房东是一对三十几岁的青年夫妻,有两个小孩,他们把珍藏多年的结婚时的被子都拿出来给我们盖。由于第二天不用出早操,房东叫我们三个人坐在滚热的土炕上,并拿出板栗、花生招待我们。我们边吃边拉呱,直到深夜。

在枣林的两天时间,我们参观了马石山革命烈士纪念馆,听胶东民兵英雄栾忠孔老前辈讲述马石山惨案,讲述军民之间的鱼水情深。八路军战士掩护解救群众的英雄壮举,老区人民掩护部队干部伤员的光荣事迹,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老区人民对党、对八路军的热爱和感恩之情。

往事并不如烟,虽然已经过去了五十多个春秋,我依然怀念当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,怀念那段深深的工友加战友情谊,怀念咱胶东老乡们的深情厚谊。

乡村记忆

xi地瓜芽

姜德照

上世纪60年代,每当过了春节之后,大地复苏,农村孩子可玩的田野项目就多起来。与吃有关的活动,大概就只有偷吃生产队的花生种和地瓜母子了。

偷吃花生种是在与大人一起为生产队种花生时,那年月孩子缺嘴,趁大人们不注意,抓一把花生种塞到嘴里,花生种都是被浸泡过的,由红变白,软了些,这样好发芽,吃的时候要把泡软的花生的皮(红衣)去掉再塞进口里,也就是孩子们解馋,大人没有吃这个的。至于吃地瓜母子,那就必须细说一下我们老家的xi(方言音)地瓜芽。

地瓜不是下种就能生长出来,种地瓜必须先xi地瓜芽。xi地瓜芽,就是生出地瓜芽的意思。地瓜母子就是用来作为地瓜生芽栽种的地瓜,这种地瓜一般是秋天生产队组织人刨地瓜的时候就选好的,这些地瓜经过优中选优,个头大小比较均匀,一般细长,上面不存在黑斑和皴伤,适合当地瓜种。这些地瓜先是搬到山上,放进早已挖好的旱井里。

旱井也叫“地瓜井”,即在山里平坦且较干燥的地方,挖一丈余深的竖井,井底侧面挖掘2—3个横洞,地瓜种储于横洞内。井里冬暖夏凉,所以地瓜就能从当年的秋后一直存到来年的惊蛰时节。

我们村东南角有一块很大的地方,属于专门xi地瓜芽的地方,叫地瓜炕,是培育地瓜秧苗的温床。那里向阳、低洼而背风,全村的地瓜炕就集中建在这里。我们村分为三个生产小队,三个生产小队在村外东面各自有自己的麦场,夏收和秋收的粮食上场,都要归到自己的麦场上,在麦场旁边都有看场屋子。三个队的地瓜炕也是分开的,从南到北排列为三列,并排一溜用青灰砖砌起的约一米高、两米宽,长度不限的地瓜炕,就如同家里的土炕一样,炕的内壁采用的是混合麦糠搅和而成的泥浆,然后再用麦秸草与马粪均匀搅拌好,铺垫在地瓜炕的底下,大约有五十厘米厚,用脚反复踩实。

毕竟是在露天,地瓜炕的温度比较低,但麦秸草和马粪发暖,这就为地瓜芽增加了一定的温度和养分底子。三列地瓜炕之间是一条通道,能并排走开两个人,每个地瓜炕下面烧火的灶口就在这里,有烧火的地方就有烟道,地瓜炕的烟道与家里的火炕道理一样,地瓜炕中空,里面砌烟道,烟火带着热气在炕里面循环一圈,再从前面用砖垒起的烟囱排出去,烧炕的烟火为地瓜炕保温。

地瓜炕上面铺上从河里运来的干净河沙,就可以在里面种地瓜母子了。种上地瓜母子,上面盖上一层塑料薄膜,然后是一层厚厚的草帘。白天的时候,上午太阳出来了,揭开草帘和薄膜,为地瓜炕洒水,保持地瓜母子周围沙子的湿度;下午太阳西下,就盖上草帘和薄膜,晚上气温降下来了,下面的灶火就开始点起来了。

此时,村里的大人小孩,都把那儿当成风景,天黑了去看给地瓜炕烧火的景象。通红的炉火和人们嘻嘻哈哈的声音,让山村增添了一个热闹的场所。我们这些孩子喜欢到这里来,并非单纯看热闹,这里烧煤烧得到处黑乎乎、脏兮兮,没什么可玩的,我们盯的是出过苗后那些地瓜母子。我们挑那些比较硬实的地瓜母子生吃,虽然不如没作母子的地瓜好吃,但也能吃出一些甜丝丝的味道,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,这也算是一种美味了。

时过境迁,如今地瓜炕早就废弃了,这个地方被村里规划盖上了住宅。可每逢走到这里,我就会想起当年的热闹情景,想起地瓜母子这个童年的美味。



安家正教授生前照片

怀故人

没有答案的答案

李秀丽

2010年,因峻青先生,我与原烟台市教育学院的安家正教授结识,当即就被他渊博的学识、坦荡的为人、真挚的情感所打动,颇有一见如故之感。从那以后,我们每隔十几天就互通一次电话,主题永远只有一个——如何传播峻青作品、弘扬胶东红色文化奠基人峻青的精神,交流文学、探讨文章、策划活动。他把自费出版的书签名送给我,我把拙文奉上请他修改。作为文学新人,我经常向安教授请教写作中遇到的难题,他不厌其烦,谆谆教导,甚至写成书信让女儿安延送给我。今年2月25日,我打通安教授的电话,电话另一端是他妻子邹淑香教授的声音:“秀丽,老安又住院了。”我知道耄耋之年的安教授身体每况愈下,近来频频住院,不过调理几日就出院了。这一次,邹教授却悄悄说,情况不太好,下不来床了。我心里咯噔了一下。

一直牵挂着安教授,3月4日,我忍不住打电话询问病情,是护工接的。护工说,大叔没有力气说话,让我接的。我坚持让安教授接电话,我在电话里大声喊:“安——教——授,烟——台——的——保——尔,你——要——坚——强——”过了很久,传来安教授微弱的回答:“好!”顿时,我泪如雨下,颤抖着挂断电话。

在我与安教授十几年的交往中,每次打电话,他都声若洪钟,侃侃而谈。有一个冬日,我刚好在外面,接到安教授的电话,他跟我谈起峻青,口若悬河,滔滔不绝,一直说了50分钟,我的手脚都冻麻了……可是,此时的安教授呢?我不敢往下想了。几天来,一直惴惴不安,就怕接到那个不想接的电话,每天祈祷着,到了晚上就庆幸安教授又熬过了一天,期盼奇迹出现。

奇迹终究没能出现。3月19日,“那个电话”还是来了,安教授的女儿安延告知噩耗。那一刻,我心情极度低沉,为自己失去一位忠厚长者而悲哀,为烟台文学界失去了一位名家而痛心!3月21日9时文登殡仪馆,是我尊敬的安教授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刻,从此再无安教授那一声声朗朗的呼唤:“秀丽嘛,你写峻青老的那篇文章,还有个地方得改改……”

安教授出生于教师世家,毕业于曲阜师范学院,从教于原烟台市教育学院。他一生著书立说,出版40部著作。我曾问他,你一身疾病,药不离身,为何还要笔耕不辍,自掏腰包出版书籍,再赠送他人,而且在封底醒目地写上“只赠不售”?我知道,他患糖尿病几十年,因脑血栓致右眼完全失明(左眼仅余视力0.25)、右耳失聪,常年的医药费,加之自费出书,已经把他的家底基本掏空。面对我的疑问,安教授慷慨激昂,说道:“我虽不是党员,但也受党教育多年,我要在闭眼前,把肚子里的东西还给社会。”安教授是这么说的,也是这么做的,他投入毕生精力践行这一理想。就在上一次住院前,他还给我打来电话,说他的第40本书出版了,让闺女送给我。我说:“安教授,现在可以串门了,我让儿子拉着我去磁山看你!”

世事无常,没想到安教授挺过了三年疫情,却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,永远地离开了我们,愿天堂没有病痛!从此我想请教的文学问题得不到答案了,但是安教授却给了我人生最美的答案:拥抱生活,热情似火。

有时候,我们不能接受死亡,是因为不能接受爱的人离开。但是,有些爱是永远不会离开的,譬如爱安教授的为人、爱他的作品、爱他的灵魂。